

从“王公馆”到长宁区少年宫

◆ 章慧敏



坐落在愚园路1136弄的长宁区少年宫,多数人对它的印象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之后在上海的“行宫”,也会理所当然地称它为“汪公馆”。其实,“汪公馆”应该叫“王公馆”,它是抗战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的住宅,而王伯群是因为大夏大学的校花才建起这座豪宅的,她就是保志宁,从校花成为了王公馆女主人。

在那个宁静的午后,保志宁的外甥、年届七旬的袁智麟先生向我谈起了姨妈保志宁的那段往事,“王公馆”在我的脑海中渐渐立体了起来。

2000元开启弦歌不辍

大夏大学的创建人王伯群1885年出生在贵州兴义县景家屯,在当地,王家称得上是名门望族。1905年,20岁的王伯群得到了舅父刘显世资助,负笈东瀛学习政治经济学,他是贵州第一批留日学生,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伯群回到家乡,与弟弟王文华等一起以黔系头面人物身份折冲于各系军阀之间,他还参与过策划护国运动和南北议和。

1924年春天,厦门大学有一部分学生为了争取民主办学,向校方提出了改革校务的意见。但由于学校当局处理不当,200多名激情满怀的学生一怒之下集体离校北赴上海,同时辞职的还有一些为学生鸣不平的教授。他们立志要筹建一所既能实现理想抱负又能光大华夏的新型大学。

但光有理想和抱负是不够的,他们找到了正在上海当寓公的王伯群,请求他出资支持他们的理想。王伯群慨然应允,当场答应捐助2000大洋,他还和师生们一起去上海各处选址。起先,他们准备在小沙渡路建校,但觉得地方不够大,对今后学校的扩展有障碍,这才决定租下丽娃河周边的土地。

王伯群这2000元捐款开启了大夏大学的弦歌不辍,也促成了他与大夏大学的不解之缘。据华师大史料记载,王伯群校长创办大夏大学时,中国新建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滩的大学多过10所,但在众多大学中间,独有大夏大学在他的领导下坚持“自强不息”之校训,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这期间,“学校广筹资金,延聘名师,购地筑校,短短几年中便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从赁屋设校起步,到1930年“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基已达300亩,校舍轮奂崇宏,教学声誉卓隆,蔚为海上私校之巨擘,更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献花拉开爱情序幕

1928年,保志宁20岁,她转学到了大夏大学。她的外甥袁智麟告诉我,保志宁是家中的大姐,起先,她和妹妹(袁智麟的妈妈)一起就读于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是一所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学校师生基本上都用英语授课交流,保志宁感觉有点跟不上课程,选择了转学。

关于保志宁的转学,外界还有一种说法:“保志宁才貌双全,男同学之追求者多而切,不胜其扰,乃转学大夏大学。”这原因也可信,面容姣好的女生的确到哪里都会引来追求者。保志宁到了大夏大学,依旧是公认的校花。

在学校的一次庆典大会上,校长王伯群在台上演讲完毕后,“校花”保志宁代表全校师生上台向校长献了花。这是王伯群第一次见到保志宁,他还根本不知道这位女生就是大夏大学赫赫有名的校花。然而,两人“爱情”的序幕就在此后拉开了。袁智麟告诉我,姨妈保志宁曾对他说过,那次,她是在王伯群三妹王文湘的授意下给校长献花的。倘若王文湘真的授意保志宁向哥哥献花,那她的目的是什么?虽然王伯群正房已经过世,但三妹或许还有其他的想法,但保志宁没有亲口说出,我们也无从猜测,不过,这段姻缘确实开始了。



保志宁新婚照



王伯群保志宁结婚照



王伯群夫妇与儿女



王伯群保志宁旧居

王保成婚建起别墅

保家本是满洲旗人,清代中期移居到江苏南通,是世代宦宦之家,她的叔叔保君健当年曾出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用今天的话来说,保志宁是位十足的“白富美”。

不管王家三妹有意还是无意,反正“献花”后,王伯群对这朵小他整整26岁的“校花”开始了苦苦的追求。当时,社会上对二人的“热恋”并不看好,理由是王伯群的年纪比保志宁的父亲还要年长6岁。然而,这对老少配的婚礼还是于1931年6月18日在上海徐园如期举行。保志宁以正妻的身份被迎娶进门。

王、保夫妇的婚礼现场很风光,上海滩大佬们纷纷出席。因为王伯群还执掌交通部部长的职位,证婚人贺词特以交通为喻,将婚礼比作“如新造巨轮之行下水礼……”

二人婚后,社会上又传出了结婚前保志宁曾向王伯群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赠她嫁妆;第二,婚后供她出洋留学;第三,为她购置一幢花园别墅。而王伯群答应保志宁先结婚后生子再留学的要求,作为承诺,他为她存下了一笔留学准备金。至于建造花园别墅说来也巧,当年的辛丰记营造厂正在承建南京交通部办公楼及上海大夏大学的教学楼,这都是王伯群管辖下的差事,这便一并交给该承建商“代劳”了。

袁智麟也曾问过姨妈有没有向王伯群提过这三个保障条件?姨妈当即否定。不过,王伯群年长保志宁26岁,正常情况下,他自然会先于保志宁离世,建一幢别墅的目的,显然是为保障妻儿生活考虑的,这也很正常。

屋址选定在愚园路后,很快就破土动工了。这幢别墅的设计师是美商戈隆洋行的柳士英,这位曾留学美国的设计师以维多利亚巴洛克风格奠定了别墅的基调,占地72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88.5平方米。主楼一共有4层,其中地下一层,地上三层,整幢建筑有两个厅,大大小小房间32间……辛丰记营造厂的老板为了取悦这位王部长,真可谓不惜工本。

工人们夜以继日地施工,所用材料无一不是上档次的。其中光瓷砖都是由泰山砖瓦厂定制的。有人估算过,仅此一项就超过了50万元。从1930年开始建造到1931年王伯群和保志宁成婚,主楼已竣工,但花园还没布置好,主楼的装修也在进行之中。

当年的舆论界对这位老校长娶小校花的轶闻本来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如今别墅建成,自然又是一番群起而攻之,讥讽王伯群是“位尊多金”。迫于舆论压力,监察委员会提出对王伯群弹

劾的议案。王伯群权衡利弊后,在1931年年底被迫辞去了交通部长的职务。时人戏称王伯群是:“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

汪精卫来沪成新主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大夏大学迁校贵阳的事务紧锣密鼓地开始了。8月下旬,学校开始转移图书仪器,并且疏散学生,10月,王伯群带领全家自南京抵达江西庐山转道贵阳与师生会合。作为第一联大的筹建人之一,他殚精竭虑,全身心付出,终于在12月27日,迁往贵阳后联大第一学期终于正式上课了。

王伯群和家人离开上海,离开王公馆前夕,保志宁曾依依不舍地将房子和室内的物品一并交给了她的叔叔保君健管理。确切地说,他们夫妇在这幢豪宅里才住了两年多时间,因为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离开带给他们福祸相兮的王公馆。

然而,保君健“代管”没多久就再也管不住了。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和陈璧君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的陪同下,乘“北光丸”抵沪。汪精卫先是住在东体育会路7号的重光堂,那里是出了名的日本特务“土肥原机关”所在地,但住房条件却相当糟糕。名义上他们的安全由日本宪兵保护着,实际却是连汪的贴身卫士都不许随便出入,连活动都受到限制。于是,在再三的交涉下,土肥原同意将愚园路的王公馆拨给汪精卫使用。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汪精卫迁往南京颐和路公馆居住,但愚园路上的这个“王公馆”仍然是他在上海的“行宫”。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周佛海也先后占用过王公馆……

劫后新生变为乐园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享年60岁。保志宁为王伯群一共生育了一男四女5个孩子,王伯群临终前,除了因缺血少药而病死的儿子外,亲人们都守候在侧,而王伯群还撑起病体,写下“公诚”二字勉励全校师生。

抗战胜利后,保志宁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这才发现“王公馆”作为“敌产”已被国民党军统接收当作招待所了。看着眼前的景象,保志宁百感交集。她回想起1937年4月16日丈夫在愚园路私邸与30多名学生导师举行的座谈会,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家主持的校务会议,从此全校师生便忙于迁校的事务中去了。物是人非。保志宁再三交涉却丝毫不起作用,她思前想后只能央求朋友出面帮忙。

终于,1946年,保志宁带着四个女儿回到故居,但家里的经济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她无法支撑这豪门开销。后来,保志宁接受朋友建议,决定租掉一、二层楼面来贴补家用。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租下了王公馆的一层和二层。

1947年末,保志宁带着四个女儿和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结伴去了美国。初到纽约,保志宁做中文老师,自食其力养育女儿们。当她再回上海时,已是38年后的1985年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公馆几次进驻过部队和机关及政府机构,1960年元旦那天,长宁区少年宫在此成立,从此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王伯群住宅铭牌